第一章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成千上万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历史浪潮的无情涤荡下,一些民族衰落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民族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她靠着自己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在同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凝聚力。这种力量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程，直接促使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形成。随着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一）中华民族与民族凝聚力

“中华”是古语，是由“中国”与“华夏”两个名称各取一字复合而成，早在魏晋时期出现，南北朝时已经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其中云：“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这里的中华是与边陲相对，是指中原地区。《魏书·宏昌传》有“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之说，这是以中华对西域，与中国语意一致。可见，“中华”主要是指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都称之为“中华”。有一个现象十分奇特，就是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没有以中国或中华为国名的，但所有朝代又都是以中国和中华为通称。

“民族”这个词中国古语中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介绍说，在中国古籍里，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把“民”与“族”两字组合构成“民族”这个新词，是近代从日本语中引进的，日语用它来翻译英语中的 nation 一词。梁启超先生在 1899 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使用了“民族”这个新概念。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人种”、“民种”、“民族”、“种族”等概念的使用十分混乱。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民族”这个词的含义和使用才渐趋定型。所谓民族，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以上两个词复合的产物，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如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振兴中华”。后来随着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走向联合，中华民族作为一

个整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主体。中华民族代表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1949 年中华民族取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更定国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不仅是指生活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之中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体，也包涵了中国古代在中华大地上活动过的各个民族。

中华民族是中国 56个民族的共同体。古代华夏族是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原因如下：其一， 56 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这个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并在共同的地理环境中繁衍和发展。其二,56 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并非独立完成的，而是在密切的交往和不断的分化、融合的演变中完成的。其三，56 个民族有一个强大向心吸引力的核心民族——汉族。汉族由于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久远的文化传统、在科学技术和农耕经济方面的相对发达，不断融合吸引其他民族。所以，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的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及其形成作了准确的描述“: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①

“ 民族凝聚力 ”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弗斯

①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 页。

廷格(L. Festinger) 认为，民族凝聚力应是使民族成员保持在民族集团内的合力，或是使人们集合在民族集团内的情感。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使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对另外一些人感到更亲近的情感①。我国学者对“民族凝聚力”有不同的界定。“一般认为，民族凝聚力包括民族整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相互间的亲和力。关于这一概念的另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将它放在精神文化的范畴内，认为民族凝聚力乃是特定民族的全体成员对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或者说，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与思想整合力”②。我们认为，对民族凝聚力这一概念作过多的理论解释，使其复杂化，并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简单化和明了化。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民族凝聚力“是指民族这一人类共同体中，能够把全体成员集聚结合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推动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③。民族凝聚力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涵。

在对中华民族和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了准确的把握之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解也就比较容易了。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包括民族心理、民族自我意识和思维方式、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人格以及道德规范等因素。

中华民族凝聚力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的共识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主体在追求客体的价值属性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实现价值追

①转引自孙玉兰、徐玉良主编：《民族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0 页。

②孙友忠：《民族凝聚力界定》，《湖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6 期。

③任涛、孔庆榕、张大可主编：《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4 页。

求的目的。当这种“特定的方式”形成民族化的、相对稳定的特征时，就构成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①。共同的价值观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在共同的价值观的指导和规范下，就会形成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愈强，则民族的凝聚力就愈大。其二，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发展目标的认同感。民族成员形成与民族发展相一致的目标认同感是增进民族凝聚力不可缺少的条件，共同的民族发展目标会极大地激发民族成员高昂的斗志和参与目标实现过程的积极性。其三，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命运感以及各族人民同甘共苦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这种自尊感在实践中会使每个成员表现出强烈的与民族息息相关的命运感以及各族人民同甘共苦的归属感，使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在实践中认识到，民族的兴亡和发展必然影响到民族团体中每个个体的幸福和发展，并在主观意识中将个体与所属的民族团体视为一个整体，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起伏，相应地表现出自豪喜悦和痛苦悲愤的情感体验。而且个体在与民族团体其他成员的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适合特定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语言、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自我与他人都熟悉并能互相地、从容地做出恰如其分的行为的方式。其四，中华民族凝聚力还表现在民族成员具有献身中华民族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把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付诸于实际行动。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条件。其一，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远祖，从原始群落发展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与周边的民族共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域之中：北面是严寒荒芜的西伯利亚冻土带，西面是难以跨越的帕米尔高原，东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这种封闭式的地理态势，使我们的祖先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创

①参见刁培萼主编：《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2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造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古国。同时，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产生古代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二，中原地区发达的农耕经济。中国古代汉族所生活的中原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形成了规模较大、品种丰富的农业经济。而周边少数民族大多处于气候恶劣、地产贫乏的牧区和山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山区采集、狩猎。这样，少数民族就必然要和汉族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并逐步被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吸引。费孝通先生曾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贴贴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①物质生活的依赖性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合作、共同进步，形成了唇齿相依的民族感情。其三，浓厚的宗法家族观念。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行社会活动，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观念。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长期延续，使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成为家族式的政治实体。虽然这种家族式的宗法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最终被统治者用来集权，但从客观后果来看，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家族观念维系统治，有助于形成具有社会意义的民族忠诚感、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义务感。其四，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从东汉末年至明末清初，儒文化日渐强化，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的封建宗法家族制的政治构架，以农立国的小农自然经济构架和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教育及知识价值取向构成的文化构架，这三大支柱共同构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中华民族的这种观念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基因，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方面，其中某些离散性特征又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化。但总体来说，这种观念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护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有其独特的途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迁徙流动和相互交往，促使各民族汇聚、融合、同化。其一，民族迁徙流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建筑、医学、水利的发展，也促成了商业网络的建立。通过这个商业网络，汉族和少数民族彼此迁徙到对方的居住地，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居住格局。这个居住格局，把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密切联结起来，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迁徙是凝聚力发展的催化剂②。其二，民族交往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的联系和依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补充的经济整体，由此把各民族汇集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其三，各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形成了血肉相连的民族感情，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在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约 300 处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中国新石器文化同样十分丰富，已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散布在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人们发现，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可以明显

①《人民日报》，1995 年 1 月 31 日。

②参见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19 页。

地划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同时又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相互间的共性。它们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并不相互重合。这说明，中华民族在起源上就是多元与本土的，而不是一元的或外来的。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国大地上活动着四大系统的中华先民。中原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民族、长江流域到东南沿海的水田农业民族、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包括渔猎和畜牧）民族，以及南部山地的游耕民族。在这四大古代民族中，最先成长壮大并成为我国古代主体民族的是中原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民族。它由西边的炎黄集团、东边的东夷集团和南边的苗蛮集团组成。

炎黄两帝有同源关系。《国语》谓："昔少典氏娶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炎、黄两族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结果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九黎的部众一部分被赶到南方，一部分被迁到西北，余下的融入炎黄两族。蚩尤死后，黄帝又取得了对炎帝战争的胜利，势力直至江汉流域。炎帝战败后与黄帝联合，定居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五帝中的其余三位：少昊、颛顼、帝喾，均属于东夷集团，他们通过结盟、联姻等途径与炎黄集团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古代主体民族"华夏族"的雏形。到了尧、舜、禹时代，炎黄族通过对三苗等氏族部落的战斗，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尧舜还将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蛮夷戎狄中去，扩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到禹时，如《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此时的地域总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禹之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制，夺伯益自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以上

①《国语》卷十。

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凝聚力开始产生，并且在各族争战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这一历史过程发展的直接动力源泉。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原委“：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轩辕乃修德振兵……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乃从而征之。”黄帝之所以能在同蚩尤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他能够‘修德振兵”，赢得民心，使其部族有凝聚力，从而能够号令天下。大禹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居于河南嵩山地区的一个部落首领，传说中他带领部族治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这就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人民中树立威信，从而激发部族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

夏、商、周三朝的奴隶制是所谓宗族奴隶制，即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统治，所有奴隶都归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族所有，王位和诸侯国的君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制，必然推行注重血缘、膜拜祖先、膺服长者、恪守传统的伦理原则，这就刺激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民族忠诚感、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义务感的产生，因而起到了一种把分散的社会细胞凝聚、维系在一起的作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意志，夏、商、周三代都毫无例外地对地方分权势力实施打击。西周是奴隶社会时期最有权威的王朝。周王统辖着全国的军队，执掌着官吏的任免，控制着全国的赋税财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对这种统一政局的深刻描述。春秋战国之际，群雄割据，而诸侯争霸的目的也还是要重建统一的局面。此时，诸子百家在理论体系上千差万别，但在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孔子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

子的‘定于一”,荀子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还是韩非子的中央集权思想,都主张国家统一。这个时期,“大一统”观念构成了社会主流政治思想,也构成社会主流学术思想。这就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夏朝的农业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已经有了原始的灌溉技术,积累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发明了指导农务的农历。商朝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畜力。周代的农业更加兴盛,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和比较准确的田亩制,耕作规模更大。夏、商、周三代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促进了国家内部经济部门的分工和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且对四周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在人类文明史中,文字的发明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很早发明和使用了文字,据专家考证,大汶口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到商代,汉字已经基本成熟,商人所使用的单字至少在3000个以上,而且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文献记录,所以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①商、周时代,中原一带流行的文字是统一的。中原四周各部落,如巴、蜀、吴、越、楚等,在春秋战国之际先后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方块字。而华夏与楚两大语言相异的民族,终因文字的归一,最终融为一族,使得内容丰富的楚文化融入了华夏文明。统一文字的广泛使用,使各民族之间不仅能够自如地进行思想交流,而且还使各民族人民有了相同的思维方式。

由于朝代的更迭,使各民族间形成了杂居的局面。夏族、商族、周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先后进入戎狄蛮夷的一些地区,形成了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杂居。各民族在频繁的战争中,为赢得胜利,

①《尚书·多士篇》。

时而结盟，时而对立。如三苗族与夏族就曾经结盟，后来又分开。周武王伐纣之时，曾经与南方和西方的庸、蜀、羌、微、纑、彭、濮等方国部落联合。各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的分化和组合，使华夏族由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变成散布于长江、淮河、汉水、珠江流域。原来很多处于华夏族四周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形成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在祖国广大地区内的杂居。这种民族杂居和迁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推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许多少数民族在与夏、商、周等族的杂居、通婚、联盟和其他交往中，融化为华夏族。

需要指出的是，华夏是中原民族的融合，是中原各族共同组成了华夏族，而不是某一特殊民族代表了其他民族。华夏是针对“夷狄”而言的，是故燕虽为周族姬姓之后，然因其地处边陲，则成了“蛮夷”。《战国策》记载，荆轲刺秦王时，就大庭广众之下自称“北蛮夷之鄙人”。相反，秦本为西戎之国，但入主中原即为中夏。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①]他们的祖籍都不是中原，就因为入主中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原人，成了华夏族的优秀代表。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为了巩固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废除先秦时期流行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了全国的法律，并且颁行全国；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修建驰道、直道，在今云南、贵州地区通“五尺道”，在岭南开挖灵渠，以加强全国的水陆联系；加快了文字统一的历史进程，使全国朝着“书同文”的目标前进。对秦始皇采取的这些措施，历来褒贬不一。主要问题是，这些措施极大消耗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

①《史记·六国年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社会矛盾。但是，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极大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自从秦统一以后，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中国封建社会曾经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我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①1963 年 3 月，郭沫若在参观广西兴安县秦代开凿的水利工程灵渠时，即兴写了一首诗，对秦始皇作了中肯的评价："秦皇毕竟是雄才，并筑长城南岭开。铚钮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联翩作主裁。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绩费疑猜。"②

两汉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形成的重要时期。

接受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赋税徭役，重视农业生产。这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文景之治"。《汉书 · 食货志》记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也有了进一步加强。《史记 · 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汉时的长安、洛阳、宛、邯郸、成都等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连接中原与中亚的丝绸之路也在此时得到开辟。两汉时期经济的繁荣、经济联系的加强，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得以凝聚的物质保证。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10 页。

②郭沫若：《广西纪行诗词二十六首》，桂林市文联 1963 年编辑出版。

大一统思想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愿望和心理定势。汉代名儒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通篇贯串着大一统的思想，把大一统作为天经地义的古今通则。正因为如此，东汉以后，尽管有时出现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没有一个自裂于中华大一统之外。他们或臣服于一个强大的政权，承认了大一统；或以“中国”自居，力图统一天下。氐族首领苻坚统一北方后说：“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北魏拓跋珪称帝后下诏：“《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

中华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把“崇文重教”作为国策加以贯彻，在文化领域的建树为后世所称道。刘歆的《七略》，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方面对图书古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司马迁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科技方面，《氾胜之书》、《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九章算术》等，无不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芒。而“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的东渐和随之而来的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则充分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先进的民族文化提高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使民族成员间共同的心理素质得以培植，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达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汉朝将秦朝没有统一进来的匈奴族、西域诸族，东胡的鲜卑族、乌桓族以及西边羌族的大部分统一进来，疆域较秦朝更加辽阔。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也更加频繁而密切。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跟匈奴和亲，把宗室女嫁给单于，和匈奴约为兄弟，首创了“和亲政策”。“和亲政策”促进了汉朝同其他民族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个时期，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融是双向进行的。少数民族固然向汉族学习，而中原汉族也从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和教益。汉武帝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带去了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回来时也带来了西域各族的文化。南匈奴附汉之后，在学习中原农耕文化的同时，也把养马术以及驴和骡传入汉族地区，促进了汉族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对汉族军事骑兵的发展以及后来通讯、驿站建设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使华夏族吸收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分。百越中的东瓯、闽越族,迁至江淮一带以后,与华夏族杂居融合为华夏族。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居住在沿边八郡一带，许多人逐渐演化为华夏族。长江流域的吴、巴、蜀以及它们后裔的很多分支,也逐步与华夏族融为一体。

由于汉帝国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统治时间长,华夏民族也因之被称为“汉”,并最后取代华夏,成为中华主体民族的称谓。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就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汉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的形成，有了这个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得到极大的加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①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从魏晋到明清的 1000 多年中，中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成形。

①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 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各民族第二次大规模融合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西晋之后，各民族在我国北方及巴蜀地区进行了长达 100 多年的混战，先后有 7 个民族建立了 23 个政权，也就是古史所说的“五胡十六国”。到公元 439 年才由鲜卑族的北魏重新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混战状态，与南方的宋形成南北朝的对峙。

这个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发生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民族大迁徙。过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迁入内地的匈奴和“杂胡”有几十万人，关内的少数民族大量增加。《晋书》说“关内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与此同时，许多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大量从中原地区外迁。《晋书·王导传》中“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反映了汉人避乱南迁的情况。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杂居中，在经济上由原来以畜牧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农业为主，在身份上由原来的部落民逐渐变为编户之民。

隋唐以后，经历宋、元、明、清等朝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这段时间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隋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日臻成熟，社会生产力总体上处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之中。各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多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为了适应农业社会的客观要求，各朝将农业作为事关社稷安危的根本，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宋代以后租佃制的普遍推行，减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手工业在陶瓷、造纸、印刷、矿冶、纺织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毫不夸张地说，15 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正如美国人肯尼迪在《大

国的兴衰》中所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15 世纪有 1—1.3 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 5000—5500 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 11 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①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差距达数百年之久，由于这个差距太大，当马可·波罗由中国返回威尼斯，向家乡人讲述中国的文明时，竟然被认为是吹牛，无人相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向心力，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

第二，民族大一统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隋唐以后，除五代十国以外，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时期，而且国力较为强盛。与此相联系，大一统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并趋于成熟。一是各民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自外于中国。契丹族建辽，自称是炎黄子孙。《辽史·世表序》说：“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辽本炎帝之后。”西夏说自己是自称黄帝后裔的北魏拓跋氏之后。金章宗规定各地对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等三年一祭，以表示“我国家拙辽、宋主，据天下之正”②。元统治者尽管未讲自己是中国古代某一大人物的后裔，但丝毫也没有自外于中国或将中国别的民族摒于中国之外的意思。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强调元朝是对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甚至朝廷名号也取自中国古籍经典《易经》。清康熙则说：“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意为清朝继承了周朝和汉朝的大一统。我国南方的苗、侗、白、布依、彝、纳西、拉祜、瑶等族相传盘古是他们的祖先。壮、黎、水、畲等族说伏羲、女

①〔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 页。

②《金史·礼志一》。

娲是他们的祖先。二是夷夏之别由明显渐至模糊。先秦时期，尽管有夷夏互变思想，但主要以文化、礼仪的高下，而不是以种族、民族的界线作为夷夏划分的标准。隋唐两代统治者均以华夏正统自居，但实际上他们均有少数民族血缘①。或许这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一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声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的原因。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把全体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王朝的重要官职均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不能问津。这对“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的传统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对当时汉族儒士们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朱元璋称帝以后立即宣告：“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③明成祖继承这一思想，说：“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④他还说：“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当然，明王朝有时也讲“内夏外夷”和“贵夏贱夷”，但总的来说，还是大大淡化了夷夏之别，尤其在人事上，从中央到地方委任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士为官员。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多次宣称“满汉一家”、“不分满汉，一体眷遇”、“满汉人民，皆朕赤子”⑤云云。自康熙亲政起，清朝在官制上实行满汉并用。清政府还提倡满汉通婚，满族人学习汉语，这就在客观上冲淡了满汉界限，有助于人们摒弃夷夏之见。总之，经过元、明、清三代的疆域开拓和民族融合，“夷狄”的概念逐渐消失，中国成了地分南北、人不分“华”、“夷”的统一的多民族

①参见郑慧生：《中华民族源出一家论》，载《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袁定基：《中华民族形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③《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④《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⑤《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九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